

11月17日至19日,2025年全国文物、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年会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举办。会议由文博专硕教指委主办、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承办,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及吉林大学相关负责人出席。本次参会人数创历史新高,来自百余所高校与文博机构的26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文物、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培养、毕业”全过程展开深入研讨。

聚焦行业需求,实现协同育人

当前,我国正处于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升文物、博物馆相关专业人才供需匹配度,解决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短缺的行业现状,是文博专硕教指委引导下高校人才培养的共同目标。

面对高校与行业的人才供需匹配难题,部分高校与文博机构率先做出探索。吉林大学历来将文博教育置于高位,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使命,现已形成体系完善、特色鲜明的专业布局,设有文物与博物馆系、考古系和古文字系三个教学单位,培养兼具文化素养与现代科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学校携手省内外博物院、考古所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形成课堂教学与馆内实务相结合双轮驱动的培养模式。同时,依托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交叉优势,持续深化文理协同、科艺融合。目前,探索成效已逐步彰显。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吉林省文物局局长宋薇提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主渠道,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拥有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专业化文博工作队伍,关系到文博事业的未来走向与可持续发展。文物部门将与教指委及广大高校一同积极地为培养模式创新、实践教学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职业导向强化等提供实践平台和资源支持,以期探索更加精细化的培养方向,共同推动文博专业人才培养。

根据全国文物、博物馆专业学位培养“启动示范、巩固提升、稳定发展”的三阶段布局,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认为,全国文博专业学位培养工作将步入巩固提升阶段,需要重点抓好学位点评估,通过深化教学改革、强化产教融合,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形成具有行业特色的人才培养典型模式,逐步实现培养规模与培养质量并重。应立足行业需求牵引,要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为核心,逐步实现组织形式、导师队伍培养、要素评价机制等深层次变革和人才培养范式升级。

聚焦“招培毕”,完善全链条

2025年,文博专硕教指委紧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围绕“建构与规范”的核心任务精准发力。迄今,文物专业学位硕士授予点共计65个,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共计65个,其中33所高校同时拥有两个学位授予点,文物博士学位授予点达到7个。面对日臻完善的专业布局,如何实现专业人才的规范化培养和专业的体系化建设,是拥有文博专业的高校在人才培养上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近年来,文博专硕教指委基于《文物专业学位类别简介及其博士学位基本要求》《博物馆专业学位类别简介及其硕士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落地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展开制度建设并不断予以完善。本次会议中,教指委秘书长陆建松教授详细介绍了《文物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在“2+X”课程体系、24学分标准等方面修订共识,这两份文件分别由国家文物局委托北京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团队拟定。同时,他重点阐述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的编制情况。重庆师范大学蒋刚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钱益江教授、北京科技大学王冬冬副教授、浙江大学傅翼副教授先后对相关文件做具体解读。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聚焦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探讨招生、培养、毕业专题,旨在期望各培养单位能以此次会议为平台,聚首研讨、经验互鉴。

关注招生环节“选准人”。吉林大学任瑞波教授、北京大学彭明浩教授、复旦大学吴敬教授、上海大学黄洋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李建民教授、大理大学寸云激研究员等介绍各校招生情况,揭示招生中普遍存在的指标受限、优质生源较少、跨专业学生多等问题,提出争取上级支持、加强学科宣传、限制报考专业等解决方案。与会专家建议:一是设置精准的交叉限制条件,如文物学的交叉生源可偏重陶瓷考古、化学、材料等多元专业背景的本科生;二是优先撮合高匹配度学科,使不同知识谱系在招生端口相遇,以助于后续学生培养的知识互补。

关注培养环节“最优化”。吉林大学唐森教授、北京大学赵增煜老师、复旦大学吴敬教授、西北大学任萌教授等分享各校培养方案,这些方案基于各校学科特色与资源,设计培养方案,加强实习实践,规范培养流程,最终培养具备较强能力的实践创新型、应用型人才。针对各校资源不一、学生背景各异的两大难题,与会专家建议:一是各校应实现特色化培养,利用地方资源,形成地方高校、地方遗产、地方发展的闭环赋能,寻找各校“最优解”;二是落地“一生一策”机制,实现“补缺口、扬优势”,加强学科专业交叉性、融合性、系统性,部分高校可以试点跨学科导师组。

关注毕业环节“查能力”。复旦大学陆建松教授、四川大学周静副教授、西北大学杨璐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周华副教授等介绍博物馆展览、博物馆教育服务、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等方向学位的论文与实践成果规范。与会专家建议:基于三个《基本要求》,强化成果认定标准,核心是通过相关成果及其实践过程,考察学生发现、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考察其成果是否源于真问题、真实践,实验设计是否合理、调查是否规范、技术路线是否合理;考察“这个问题是怎么出来的”,对解决实际问题是否具有指导性和创新性。

迈向内涵发展,推动提质增效

会议指出“案例教学方法、核心课程体系、联合培养机制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瞄准专业化定位提质增效,将是文博专硕教指委与高校人才培养的未来方向。为此,国家文物局委托开展了指导性培养方案、案例教学体系、核心课程指南、联合培养机制、博物馆知识点与技能点学习与实践等研究项目。

在案例教学方面,国家文物局依据典型性、启发性、前沿性、交叉性的原则,组织相关老师开展了研究。复旦大学郑奕教授、浙江大学傅翼副教授、北京科技大学李博教授、西北大学毛维佳老师分别展示了他们在博物馆展览和教育服务、可移动文物保护、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等方向的案例教学体系的研究进展。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编制并发布申报指南,面向各培养单位和文博机构开展案例征集申报工作,并评选优秀案例向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推荐,纳入“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案例库。

在核心课程体系方面,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和上海大学已受托开展文物博物馆专业学位核心课程指南编制研究工作。相关指南将以基础性与前瞻性兼顾、专业性与交叉性并重、知识传授与实践能力并重为原则,帮助学生建立动态思辨的认知论与方法论,培养学生知识体系自主建构与创新能力。

在联合培养机制方面,国家文物局积极推动“博物馆+高校”文物修复人才培养模式试点,并组织开展文物、博物馆专业学位联合培养机制调查研究。湖南大学雷玉琼教授在分享“文物、博物馆专业学位联合培养机制研究”课题研究进展时,建议汲取医学、农学、工学等的联合培养经验,结合文物、博物馆专业特点,探索双导师制、项目制、实习实践基地等联合培养机制。

陆建松表示,2026年将是文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从“分类调整”向“内涵发展”迈进的关键一年。学位授予点评估准备与培养过程专业化两大任务既是质量保障的“压舱石”,也是资源升级的“加速器”。未来文博专硕教指委将始终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务实举措推动重点工作落地见效,以协同发力来强化培养体系的韧性,持续搭建“标准引领、资源共享、质量可控”的教育发展平台,为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具备专业素养与文化担当的高层次人才,以满足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人才之需。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在宏大叙事中探索博物馆策展新境

——“宏大叙事·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湛 王棣

11月8日,由陕西省文物局、四川省文物局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承办,博展联盟协办的“宏大叙事·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所科研机构,以及包括15家央地共建博物馆在内多家文博机构,包括15家央地共建博物馆在内多家文博机构的140余位文博专家参加了会议,共谋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设置主旨发言、分会场研讨与圆桌沙龙等环节。其中分会场一聚焦“新时代博物馆策展的叙事构建与创新实践”议题展开讨论,分会场二围绕“中国青铜文明的研究阐释新视野”进行专题研讨。

理论思辨: 探索叙事构建与理念创新

会议聚焦策展叙事方法的创新与理念突破,与会专家从学理源头出发,围绕新时代博物馆“为何叙事”“如何叙事”等根本命题展开系统思辨。

主旨发言环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提出在宏大叙事之外,博物馆应大力开拓多元、微观的策展视角。他倡导围绕青铜器的艺术价值、技术工艺、动物纹样等小而有趣的专题进行深度挖掘与呈现,为观众构建更立体、更富美感的认知体验。复旦大学教授魏峻从叙事学理论出发,系统梳理了其在博物馆领域应用的历史脉络,并归纳了多种叙事类型。他提出博物馆展览的叙事并无固定模式,理想的叙事策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寻求平衡——情感与理性、宏观与微观、权威与多元的有机统一。浙江省博物馆馆长纪云飞提出博物馆应以“破壁、赋能、共创”为核心策略,构建博物馆与社会的共生合作网络。他提出博物馆策展应构建五大合作维度,通过重塑博物馆的机构使命和宗旨,推动博物馆普及化,纵向与高校、科研机构深化合作,横向与不同领域、国际机构破圈联动,让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博物馆的价值创造。

在分会场一的研讨中,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陈叙良认为,互联网与自媒体重塑了文化传播格局,促使博物馆必须用全球化语言讲好在地文化。他还介绍了以“在地性回应全球性”为原则构建具有主体性、国际表达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展陈体系。安阳博物馆馆长李晶分享了以“小人物见证大历史”为理念的展览实践,通过第一人称叙事构建个体与历史的关联。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庆卫介绍了以“空间即叙事”为理念的改扩建实践,通过优化展览布局与观众体验,实现文物保护与公众教育的结合。北京大学研究员王思渝认为,宏大叙事可以通过挖掘与当代观众紧密相关的切入点来实现。在宏大历史史框架下通过设置独立展示空间突出人群流动等当代性主题,能有效增强观众共鸣与记忆点,使展览既保持宏大格局又贴近观众需求。在分会场二的研讨中,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长王勤沂通过数字展览实践,阐述如何弘扬长

陈列展览部主任尹恒归纳了中国博物馆策展实践正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为底层逻辑,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三重转型,在理念上从权威叙事转向多元对话,通过包容性策展构建社会共情空间;在功能上从呈现历史转向活化文化,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在沉浸体验中守护文化本真;在空间上从地域场馆转向全球客厅,通过实体与数字双路径促进文明互鉴。

实践探索: 多元案例呈现策展新境界

会议汇集了众多具有示范意义的优秀实践案例,既展现了构筑宏大叙事展览的方法与路径,也集中呈现了国内外博物馆在展览展示方面的创新成果。

主旨发言环节,浙江省博物馆原馆长陈浩以迪拜辛加达博物馆为例,阐述其由22个主题展馆构成的独特展陈体系,如何采用艺术和技术的手段生动讲述迪拜城市故事,为我国历史街区、古镇古村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宝贵借鉴。南京博物院院长王奇志分享了“观天下”大展的策展经验。该展览以全球史视野,通过“承转合”的叙事结构,讲述了明代中晚期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与文化交流。四川博物院党委书记向和频以即将推出的“雪山之巅 大河之源”展览为例,阐述了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命题,落地于青藏高原具体的历史遗址、文物与事件中。作为“吉金·中国”展览的策展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庞雅妮从策展背景、策展思路及体会思考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了“吉金·中国”展览如何凝练主题、构筑叙事和建构意义,探讨博物馆如何通过展览选题、展览研发、项目管理和机制创新,策划更多宏大叙事、重大题材的展览,更加精彩地讲好中国故事。

在分会场二的研讨中,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谭婉玲介绍了以通史陈列与临时展览双轮驱动的展陈模式,实现从“文物解说”向“文化体验”的转型。山西博物院副院长赵志明以“晋魂”为核心重构展览叙事,通过专题展与区域合作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何广概括了策展创新的主要趋势:实体展向虚拟空间延伸,通过VR和沉浸式影像等数字技术提供更丰富的体验。山东博物馆副馆长王勇军重点介绍了“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通过文物、内容与空间结合,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生动展览,实现知识性与情感共鸣的统一。河北博物院副馆长王然分享了如何以创新为引擎,结合文物与现代艺术打造精品展览,推动地方文化发展。在分会场二的研讨中,广东省博物馆主任白芳以即将推出的漆器主题展为例,探讨如何实现展览创新与视觉突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考古博物馆)馆员王钰沂通过数字展览实践,阐述如何弘扬长

江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

学术深耕: 青铜文明研究阐释的新视野

会议聚焦青铜文明研究的新视野,为推进中华文明探源成果转化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主旨发言环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通过大量科技分析清晰勾勒出三代跨地域的金属资源流通网络,证明了从二里头文化至商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的传播与本土化促进了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强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文胜聚焦青铜文明视角下“三代同源”与中国礼制文化溯源,论证了“三代同源”实为“三代同祖”,夏商周以多源头、多族群形态统合于中原农耕文明,是夏商周三代青铜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诠释。

在分会场二的研讨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通过金文历日资料,严谨辨析“初吉”的阴历与阳历之说,为青铜器断代提供了新视角。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苏荣誉认为,中原铸工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发明的垫片工艺,为中原及受其影响的青铜器所独有,奠定了铸造工艺的技术基础。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翟利平从青铜器视角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表现形式与丰富内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侯红伟以秦文化铜器为例,探讨秦对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秦平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肥西三官庙遗址部分铜器造型融合西北、北方与中原因素,结合器物特征、年代及矿料来源,揭示了商初中原贵族南迁的图景。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院长宁亚莹提出,青铜文明是国家形成的“催化剂”与“见证者”,青铜铭文通过传承历史、传播“德”“孝”价值观、推广统一金文,强化了文化认同与国家精神基础。江西省博物馆副主任陈书廷系统梳理“虎踞江南”展览的策划与实施历程,为同类青铜主题展览和“旧题”新展的策划与实施提供了参考。

本次会议围绕核心议题开展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充分展现了青铜文明研究阐释的多元视角,以及新时代博物馆在叙事构建与实践创新方面的探索。会议在理论探索、实践创新与协同发展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理论层面深化了对青铜文明在中华礼制与国家进程中的奠基性作用的认识;实践层面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性的创新策展成果;协同层面进一步夯实了馆际、跨领域合作基础,为推动博物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注入了新动力。展望未来,代表们一致呼吁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成果转化,推动博物馆从“知识宝库”向“故事空间”转型,让文物、遗产与古籍“活起来”,为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提供支撑。

(作者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学术纪要

长江文化的研究阐释与传承创新

“江渎文化与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川召开

11月19日,由四川博物院、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出版中心、四川省水利厅信息中心主办的“长江文明·江渎华章——江渎文化与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博物院召开,旨在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阐释好长江文化内涵。

来自长江文化促进会、四川省水利厅、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出版中心、四川博物院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所等高校、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企业等专家学者和单位代表近80人齐聚一堂,围绕江渎文化的历史价值与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度研讨,为四川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与学术智慧。

会议主旨发言环节,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

零以视频发言的形式阐释了江渎文化与长江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武汉大学教授刘汉俊以宏观的视角,从人与水相生相伴的自然历史脉络梳理了从江渎崇拜到“四渎”祭祀的发展进程,揭示江渎文化既体现了国家意识、民本观念,又承载着天人相生的哲学思想和尊重规律的科学思维;四川大学教授彭邦本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对蜀地的江神信仰进行了深入探讨,着重分析了江渎传说的二重性;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姜巍结合文化类纪录片的创作拍摄实践,分享了在信息爆炸、短视频主导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以更好的视角解读、以更好的温度守护文化根脉,提升地域文化宣传影响力的实际路径;四川省旅游学会会长陈加林以四川省文旅发展的展望为大背景,从梳理江渎源头文化、梳理四川江渎文脉、辐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培育江渎文化旅游品牌四个方面提出了成都江渎文旅融合发展的思路;四川省民

俗学会理事胡开全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与概括明代不同时期成都江渎庙的发展历程,揭示江渎庙承载的传统生态观。在主题分享环节,专家学者从江渎信仰的起源、江渎神的知识图谱、江渎文化与水崇拜、道教视野中的江渎文化、江渎文化与文旅融合等维度进行了探讨交流。

“传承千载的江渎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与思想支撑。下一步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推动研讨成果转化行动,让千年江渎文脉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为筑牢长江生态屏障、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大力量。”会议相关负责人介绍。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四川博物院青铜文物研究中心授牌仪式和四川博物院藏“南渎大江之神”及二神妹青铜造像初步研究成果推介,同步举办了江渎非遗·文创市集等配套活动。

(廿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相关学术讲座

化,可能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这些文化的共同点在于“敬天法祖”,这种文化认同为中华文明走向“一体”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为距今6000年至5100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这一时期,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油子岭文化等在聚落规模、房屋墓葬大小、礼仪制度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分化。韩建业以灵宝西坡遗址为例,指出其宫殿式建筑和大型墓葬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等级分化。同时,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和崧泽文化的东山村、凌家滩遗址也显示出区域文化的高度发展,中国各地逐步迈入“前国家”社会状态。

文明形成:古国文明

距今5100年至4100年是中华文明的“古国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各地出现了多个“古国”,最明确的见证就是南佐、良渚两个都邑遗址。两个遗址面积都在600万平方米以上,核心区都有30万平方米,核心区都有宫殿区,其建设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其严整布局体现王权、神权结合并以王权为中心,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原生国家的都邑。

文明早期发展:王国文明

距今4100年左右,长江中游地区至少已经通过“禹伐三苗”事件被纳入华夏集团版图。《尚书·禹贡》等记载的夏禹划分“九州”,很可能即真实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据此可以说,至迟在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建立起“大一统”的天下王权。这些标志着“王国文明”阶段的到来。

文化基因: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原因

韩建业总结指出,中华文明具有“一元多支一体”的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仅体现在宇宙观和礼仪制度上,更体现在文化基因中,“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原因。韩教授强调,这些文化基因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精神支撑,也为当今社会的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依据。

讲座现场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围绕“文明标准”“区域互动”“古史传说”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韩建业指出,文明起源不应以“国家”为唯一标准,而应从文化认同、礼仪制度、宇宙观等多维度综合判断。

(王嘉雯)

概念阐释:文明与国家

讲座伊始,韩建业从概念入手,阐释了“文明”与“国家”的关系。他指出,文明是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文化实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国家则是文明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他强调文明具有跨社会形态的稳定性,而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具有独特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中华文明的起源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距今8000多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这一时期,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裴李岗文化、大地湾一期文化、兴隆洼文化、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